

#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生发逻辑、内在机理 与成功密码〔\*〕

胡洪彬<sup>1,2</sup>

(1. 浙江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2. 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根基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出来的重要结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着自身独特的体系框架和内在逻辑,其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主导性动力,以人民的积极作为为主体性动力,并在党和人民的互动和配合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协同性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突破,成功的密码就在于其作为系统性工程彰显出了自身的独特属性,并对其内在的关联性进行了科学性的建构,从而在理论基础、具体运行、生发立场、方法嵌入和目标实现上,坚持住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权威性与为民性的统一、统筹性与协调性的统一,以及整体性与渐进性的统一。沿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断前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将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也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系统架构;动力机制;优势根源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10.009

建设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历史使命。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sup>〔1〕</sup>“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概念的明确提出,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亦反映出其在对人类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认识上的拓展和升华,其必将指引着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不断前进。那么,作为一个理论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作者简介:胡洪彬,法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省“八八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新常态与应对机制研究”(20BK199)的阶段性成果。

路到底从何而来？其究竟内蕴着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和框架？又在何种层面上彰显出了自身的特性和优势？这些问题便成了当下学界亟须作出澄清和阐明的重要方向。本文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根基和历史脉络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其内在的系统架构和动力机制，进而对其内在的优势根源作出了系统总结，以期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深化认识提供学理支撑。

## 一、追源溯本：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根基与生发脉络

现代化 (Modernization)，作为社会学范畴，本身属于“舶来品”，主要指 18 世纪后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技术等领域产生的急剧变革的过程。对此，一些西方学者都曾有过相关的阐释和界定。如美国学者布莱克 (Cyril Black) 就认为，现代化即一个社会获得“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国家所共有的特征”<sup>[2]</sup>的过程。英国学者本迪克斯 (Reinhard Bendix) 则将现代化视为“社会变迁的一种类型”，认为其“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政治性的法国大革命”<sup>[3]</sup>。现代化的概念虽肇端于西方学术界，但事实上对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追求则绝非西方所独有，而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和共同期盼，且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属性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既契合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彰显出了“中国式”的逻辑特殊性，其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一) 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代化理论

早在一百多年前，在马克思恩格斯所领导和推进的工人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就蕴含了其有关现代化的理论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首先肯定了资本主义在人类社

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意义，他们既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价值观建立中的革命性作用，也赞赏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4]</sup>的客观事实。但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深刻地指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sup>[5]</sup>但实际上“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而“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sup>[6]</sup>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不仅人们之间“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sup>[7]</sup>而且通过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开辟以及资本的掠夺，亦造成了“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以及“东方从属于西方”<sup>[8]</sup>的悲惨境遇。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充分论证。他们指出，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端，必须对其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sup>[9]</sup>唯有推动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10]</sup>也唯有达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11]</sup>人类社会才能在打破一切不合理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真正走向现代化，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理论，并结合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对其进行了发展创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之初，国内经济衰败、百废待兴，针对这一实际，列宁明确提出了“必须使工业更加现代化”和“按现代化的方法从事经营”<sup>[12]</sup>的发展理念。为尽快摆脱落后状况和改善民生，列宁主张对资本主义的有益成分进行大胆吸收与利用。在他看来，“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 + 等等 + 等等 = 总和 = 社会主义”。<sup>[13]</sup>可见，列宁同马克思一样，并未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行全

盘否定,而是对其中的积极成分进行了批判性吸收。为推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列宁高度重视提升劳动生产率,他不仅组织经济发展竞赛和鼓励社会主义内部的竞争参与,而且积极推动劳动组织方式的发展创新,以期为现代化建设创设良好环境,另一方面,列宁亦把发动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摆在核心位置上,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政治进步,“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助才行”。<sup>[14]</sup>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根本而言就在于“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和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sup>[15]</sup>正是基于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和系统推进,确保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初步探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框架建构

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带来了新希望。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亦被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继承和吸收,并逐渐开启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历程。早在建党初期,面对“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主张以革命手段来实现工农专政和民族独立,以扫除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此后,中国共产党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对国家现代化的实现作了初步探讨。如经济层面上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sup>[16]</sup>政治层面上力主建设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sup>[17]</sup>文化层面上强调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逐步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

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sup>[18]</sup>的目标任务。在此基础上,1957年,毛泽东又进一步将“现代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国家”<sup>[19]</sup>建设范畴,体现了党对科技进步的高度重视。至1964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目标最终得以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现代化的探索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其不仅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明确了整体方向,同时也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发展树立了基本框架。

(三)创新突破: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塑造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正轨,我国也逐步开启了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1979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在党内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重要概念。<sup>[20]</sup>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又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sup>[21]</sup>由此出发,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系统性设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个层面的,“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sup>[22]</sup>这是解决一切国内国际问题的根本基础。而要有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又突出强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其中“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也“是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sup>[23]</sup>改革开放则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sup>[24]</sup>社会主义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sup>[25]</sup>为我所用。可以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为科学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又力主对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如在经济领域强调计划 and 市场的紧密结合,在政治领域强调推进政治体

制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文化领域注重培育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等,并基于实践研判和目标定位,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邓小平曾多次从“小康”“中国式”“中国的模式”等独特角度出发作出阐释,他的这些理论跟随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落实。

(四)深化拓展: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熟定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奋发图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进了新时代。习近平明确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重要目标”,也“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sup>[26]</sup>必须坚决予以推进落实。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境况,习近平对以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作出了全新阐释,譬如,对于农业的现代化,习近平认为“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并由此进一步提出了“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sup>[27]</sup>的新概念,从而为推进新时代现代化的深化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对于工业的现代化,习近平认为,西方国家遵循的是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串联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工业化则同城镇化、信息化等是叠加并联的,为此他力主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四化”并举。对于国防的现代化,习近平则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军事人员现代化、军事理论现代化和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等新的战略任务。对于现代化的目标,习近平亦更加突出地强调了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紧迫性。不仅如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还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实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概念的拓展性认识。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未来我国发展“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擘画了更加细致的发展蓝图。可以说,新时代以来党中

央在治国理政各领域展开的深化探索,已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其建设实践迈上了一个新的发展台阶,也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向了成熟定型。

## 二、内在机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系统架构与动力机制

由上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遵循了自身独特的发展逻辑,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开始了新的探索,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这使中国式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带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亦非一蹴而就,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达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总结和创新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既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模式,亦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存在本质性差异。因此,要科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就须做到“由表及里”,对其内在架构和动力机制作出系统性的分析。

###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系统架构

作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递升过程,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多层集成”的范畴,渗透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各领域。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就曾将现代化的过程概括为“革命的”“复杂的”“漫长的”“系统的”和“全球的”等多个特征,在其看来,现代化的展开决不能简单归纳为某一范围或某一因素,它实际上蕴含着的是人类思想和行为之一切领域的巨大改变,且其中任一因素的变化将对其他因素的变化带来影响,由此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sup>[28]</sup>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戴维·阿普特(David E. Apter)亦指出:“现代化是一个人类事务变得日益复杂的过程”,“将系统论中的一般方法运用于现代化的实证研究,其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sup>[29]</sup>事实上,现代化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并非

由现代化本身所决定,而是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过程性带来的结果,是社会体系的联动效应推动着现代化各要素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中叶就有过相关阐释,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sup>[30]</sup>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由此最终就必然会带来“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sup>[31]</sup>在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恩格斯亦强调其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sup>[32]</sup>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本质上也是基于社会关系的整体视角进行阐释的。系统性原则既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直接前提,也构成了现代化理论的方法论内核。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要义,既遵循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式”特性,是内嵌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展开,因此,其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同样有着极为严密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从内在构成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从最初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到21世纪初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为特征的“新四化”,再到十八大之后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伴

随时代的发展实现了自身的结构性拓展。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既前瞻性地突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破解发展难题的重要意义,又创新性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出发进行总体布局,并基于实践发展实现了主观与客观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

从理论建构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注重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高度进行系统性提炼,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其最终形成了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的“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并为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从目标定位的角度看,从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来建成社会主义,到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来绘就民族复兴的伟大蓝图,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推动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最终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目标可谓愈发清晰明确。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的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即要做到“十个指头弹钢琴”。<sup>[33]</sup>基于这一系统逻辑,便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独特的系统架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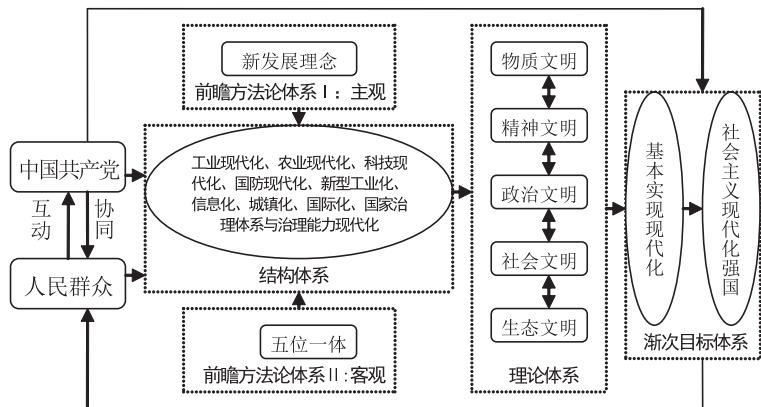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系统架构

在这一系统架构中,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界定,通过建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来推进现代化结构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推进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提供了坚实的核心保障。人民群众则主要通过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具体展开提供了社会性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亦始终坚持将对人民的需求和利益的关照摆在根本位置上,而为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目标的有序展开和实现,党同广大人民群众亦在互通和联动的基础上实现了紧密协同,由此,在确保信息流通和现代化系统的有序运作中,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之整体体系的科学和有序运行,及其目标体系的不断趋近。

## (二)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动力机制

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框架搭建,既厘清了其内在运行机理,也客观上明确了其运行的动力机制,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能够得以开创和不断前进,源于以下三重动力的坚强推动:

1. 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动力。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都是其中无可替代的核心中枢,并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展开,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加以实现:一是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理论创新。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并将其同中国实际进行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众多理论成果,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的深化发展,这为其领导和推进中国现代化构筑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二是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无论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建构还是新发展理念的明确提

出,这些方法论层面的创新对中国现代化的前进带来了规范引导效应。三是指明了中国现代化的科学目标。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这亦为促进有序的发展指明了科学的前进方向。可以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及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与前进方向,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确保其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性动力,并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和不断前进提供了强大的保障支撑。

2. 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推进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早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就明确提出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sup>[34]</sup>的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属性,以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确保了人民群众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亦使其参与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如在社会经济建设领域,正是因为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在短期内就实现了快速恢复,并为顺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夯实了根基,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参与又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创新、经济结构优化和实现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工农业产值的不断攀升、社会经济基础的不断巩固,最终推动了整个国家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根本性转变。在国家治理领域,正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积极作为,才有效防止了公共权力被滥用的危机,并推进了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而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夯实了社会根基。在生态建设领域,正是基于新时期以来人民群众对生态治理参与的积极性的不断提升,及其参与模式不断趋于多元化,才广泛凝聚了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共识,我国的生态治理体系也才不断走向现代化。可以说,人民群众的参与和作为不仅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提供了支撑,而且在很多时候亦构成了考量中国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变量。同党的主导性动力机制不同,人民群众主体性动力机制很大程度上是自发建构和运行的,因而更具时效性、主动性,并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效率的不断提升。

3. 党和人民群众的紧密互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协同性动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主导性和主体性动力,但绝不就意味着这两种动力的展开毫无关联。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革命、建设还是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党同人民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的沟通与互动在事实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协同性推动力。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极端贫困的环境,中国农民自发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型农业经营模式,随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通过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作出了回应和充分肯定,由此才推动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新时代以来,面对基层社会发展难题,一些地方的基层党组织亦同人民一道,将德治、法治和自治三者融合统一,从而为实现基层治理的善治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历程中,无论是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在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等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和广泛顺应民意,并由此激发出人民群众强烈的参与热情,进而在二者之间实现了紧密的协同互动和功能互补带来的积极性成果。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sup>[35]</sup>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外无任何自身的特殊性利益,这为其建构同广大人民群众的互动协同和凝聚中国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条件。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正是因为其积

极且有序的参与和配合,其自身在发展实践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才得到了巨大提升,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亦才赢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和认同。可以说,党和人民群众的互动与协同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开创和发展提供了双重推进力量。

### 三、成功密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系统属性和优势根源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任何系统都有其内在的综合性、层次性和环境关联性等基本属性,但与此同时在不同的背景和框架下又能展现出其各不一样的特殊性,而正是这些基本属性和特殊属性,维系着系统的有序运行及其结构功能的最优化。<sup>[36]</sup>上述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脉络和系统架构的逻辑分析,不仅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运行机理,同样也在客观上体现出了其内蕴的特殊系统属性,并进而由此展露出这一新道路内蕴的优势根源。一方面,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从上文分析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由党和人民共同推进的结果,即其系统属性绝非单一,而是涵盖了传承性、创新性、自主性、开放性、权威性、民本性等多个要素层面,而作为动态的实践性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系统属性的彰显又绝非孤立和杂乱无章的,而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了对立统一和质量互变等的矛盾运动规律,由此才逐步彰显出自身的内在优势。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根源在于对这些基本特性间内在关联性的科学建构。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路走来,成功的密码就在于其在自身的系统属性上坚持住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统一。

(一)从理论基础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住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sup>[37]</sup>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所以能够得以开创,首先就在于其坚持了理论的继承性,即其是以先进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引而展开

的,而这一理论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现代社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其不仅阐明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鲜明地指出了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最终形式体现在物质基础上是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体现在社会结构上是形成“全面的关系”,体现在人的品质上则是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sup>[38]</sup>可见,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指向的历史空间,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中国式的现代化正是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才得以形成的。缺乏这些理论的支撑,这一新道路的开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引,但诚如上文对历史脉络的分析所示,其也绝不是经典理论文本之下的故步自封,而是结合时代和实践发展作出了突破性创新,即在理论上进一步彰显出了创新性。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便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此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不断前进,亦在推进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实现了理论创新,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结合我国具体实际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既重视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又推进对生态环境的治理,由此推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这些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性发展,可以说,理论继承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正确方向。

(二)从具体运行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住了自主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毫无疑问,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国家是最早进入现代社会的,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人类的现代化道路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模板和程式。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得以开创并不断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系统运行中始终做到了坚持自主性。人类既往的现代化史充分表明,一个国家如果无法自主性地选择和把握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及其运行模式,那么就极有可能在陷入他国的圈套中走向失败和没落。对此,从“华盛顿共识”影响下的东欧和拉美国家身上就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式现代化绝不盲从,也绝不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坚持做到了从中国的实际需求出发,将现代化的模式、步骤、方向、动力和结构等因素的选择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正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牢牢地掌握了自身的主动权,绝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胁迫和压力,才能够在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的,“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sup>[39]</sup>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强调“中国式”的自主性,但绝不意味着其就是封闭的、孤立的,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强调开放性、包容性。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任何系统唯有不断同外界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才能带来自身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运行同样不例外。“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sup>[40]</sup>“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sup>[41]</sup>在这一理念指引下,新时代以来党中央把全面深化改革和深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开放战略摆在了核心位置上,通过不断拓展与创新对外贸易方式、加快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可以说,既坚持自主性又强调开放性,既绝不盲从又有选择地学习借鉴他人的经验长处,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能够实现独立和有序运行并取得成功的重要根源。

(三)从生发立场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住了权威性与为民性的统一

立场问题是带有全局性与根本性的问题,立



场不明确、不坚定,现代化建设就可能出现方向走偏的现实危机。所谓现代化的立场,简而言之就是现代化推进主体对现代化本身所秉持的态度。其根本上要解决的是为何现代化、为了谁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命题。百年来,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首先在于其于立场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承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威性。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推动力,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执政,中国的现代化将无从谈起。正如恩格斯所言,“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sup>[42]</sup>正是因为党的全面领导,才更加高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切实做到了攻坚克难,也正是因为党的坚强领导,才有效克服了局部和短期的利益纷争,从而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成功,亦在于其始终坚持做到把人民摆在中心位置上,即充分彰显出了为民性的内在特征。对此,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农业发展历程中就可看出,无论是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紧密地团结群众并切实做到服务群众,始终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得以全力推进的根本前提,也是其每每遭遇挑战和危机时,最终都能化险为夷的重要根源。对此,毛泽东曾明言:“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sup>[43]</sup>邓小平更是将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和“拥护不拥护”视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正所谓“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sup>[44]</sup>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这使其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切实地把握住权威性与为民性的统一,以确保现代化的正确发展方向。显然,这较之西方国家以私有制和资本为驱动的现代化模式缺乏合力和公正性而言,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超越。

(四)从方法嵌入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住了统筹性与协调性的统一

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其整体架构内部多个结构和要素之间的互通联动,及其现代性的转变过程,这决定了现代化的运行除了要强调理论的创新和立场的明确外,对嵌入方法的科学性选择亦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方法论建设,在对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进行继承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中,亦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一方法本质上就是实现了统筹和协调之间的紧密结合。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系统整体的统筹性。譬如,面对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现实阻滞,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并阐发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以通过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等途径,来为推进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保障。新时代以来,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改变,习近平更是多次强调科学统筹的极端重要性,不仅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sup>[45]</sup>而且更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sup>[46]</sup>“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sup>[47]</sup>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亦突出了具体运行的协调性。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着重对我国农业与工业、沿海与内地,以及中央和地方等多层关系的兼顾和协调发展作出了系统性阐释,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sup>[48]</sup>而作为新时代中国现代化主观层面之前瞻方法论的新发展理念,其中之一便是突出强调了城乡、区域之间等方面协调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可以说,党领导之下的现代化统筹是基于内在协调基础上的统筹,而现代化系统架构的内部协调亦是在坚持整体统筹之下的协调,正是因为科学做到了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才确保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有序有效展开,并在实践中带来了全面性的发展和提升。

(五)从目标实现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住了整体性与渐进性的统一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有其自身的发展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同样也不例外。但同西方现代化强调以资本逻辑为基础自然生成和建构的目标定位不同,中国的现代化则是把现代化同人民群众的幸福以及整体民族的复兴有机结合起来,这就必然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展开,不仅在结构体系和方法嵌入上内蕴着复合性和多元性,其目标定位同样也必定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规定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将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界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并非单一层面的现代化,而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现代化,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走向完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坚持目标定位的整体性,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内在相通的,也正基于此,才确保了现代化自身系统框架的稳序运行。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了目标的整体性,同时也坚持和把握住了实现目标过程上的渐进性。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还是新时代对我国未来发展“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其中所内蕴的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上的渐进性特征。正是因为这种渐进性,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来对各种体制机制不断作出调整以适应变化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环境,也正是因为这种渐进性,才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避免了一些国家采取激进主义“休克疗法”带来的惨重代价。可以说,正是因为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上坚持和把握住了整体性与渐进性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才有效保

持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内在稳定,进而才在自身发展进程中获得了不断成功。

#### 四、余 论

1978至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人民币3679亿元增长到了82.71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从人民币381元增长到了59660元,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sup>[49]</sup>而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仅2021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就已达人民币532167亿元,同比增长12.7%,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同比增长了12%。<sup>[50]</sup>此外,近些年来我国的民主法治、思想文化、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和科学技术等均取得了巨大突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各领域的飞速发展,不仅推动我国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亦确保我国如期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显然,这些成就取得的根源就在于党领导人民在遵循中国逻辑的前提下,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本文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体系架构及其动力来源作出系统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内在的优势根源所在,以期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来龙去脉”和运行机理进行明确。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基于其实现了系统性的展开和全方位的兼顾,才在形成历史合力的基础上取得了不断的成功。展望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沿着这一道路不断前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将如期实现,中华民族也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注释:

[1][39][4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2]叶克林:《现代化理论:从斯梅尔瑟到布莱克和贝尔——再论美国发展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流派》,《学海》1997年第3期。

[3]何传启:《现代化概念的三维定义》,《管理评论》2003年

第3期。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6][7][8][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275、277、294页。

[9][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5、69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7页。

[12][14]《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53、197页。

[13]《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0页。

[15]《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6页。

[16][17][4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1、1058、1096页。

[18]《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79页。

[20][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14页。

[21][24][25][4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8、373、78页。

[22][4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133页。

[26]习近平:《在学习〈胡锦涛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1页。

[27]宋林飞:《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习近平现代化思想初探》,《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6期。

[28][美]塞缪尔·P.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载于[美]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44-47页。

[29][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30]乌杰:《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33][45][46][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02、347、221、247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4页。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页。

[36]常绍舜:《系统科学与管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41页。

[37]《列宁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43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2页。

[48]《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49]张建平、沈博:《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当代世界》2018年第5期。

[50]熊丽:《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2.7%》,《中国食品安全报》2021年7月17日。

[责任编辑:刘 璠]